

文物新发现



陶南山馆：

避乱而建的古籍庇护所

□ 本报记者 鲍福玉

在全国第四次文物普查中,位于泰安肥城的陶南山馆作为重要新发现悄然进入大众视野。这座曾隐匿于乡野的院落,是清末著名的私人藏书楼——海源阁在肥城的藏书地。它是清末藏书世家躲避战火为典籍寻觅的栖身之处,更承载着中国古籍文化的薪火相传,成为跨越百年的文化见证者。

乱世筑馆：
为古籍寻一处安身地

陶南山馆的诞生,始终与“守护”二字紧密相连。清咸丰四年,太平天国运动的烽火逼近聊城,海源图第二代主人杨绍和望着家中珍藏的万卷古籍,焦灼万分。彼时,作为清末四大藏书楼之一的海源阁,已汇聚无数宋元珍本,若遭战火侵袭,将是中华文化难以估量的损失。

“事危矣,子父子子宜应徇(殉)国。然明德达人,不可无后……子奎奉母孀子住居之,而后驰纾父难也可。”岳父傅秋屏的一句话点醒了他。杨绍和随即把目光投向聊城百里之外的肥城——这里地处陶山之南,“境僻而山匪,土沃而民纯”,恰如乱世中的世外桃源。于是,在肥城西南的“华耐庄”(今庄镇花园村),陶南山馆应运而生。

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、海源阁藏书研究专家丁延峰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,杨氏信奉“大乱居乡,小乱居城”的观点,长久保存自己辛苦收藏的典籍,陶南山馆这座以方位命名的院落,从一开始就肩负双重使命:既是杨氏族人躲避战乱的居所,更是古籍的“避难所”。

海源阁最后一位主人杨敬夫曾回忆,家族遵循“书分两份”的祖训,聊城故居仅藏四成,其余六成珍贵典籍皆存于陶南山馆,由此可见,陶南山馆当时的藏书量比海源阁还多。在那个战火纷飞的时代,这座别院成了古籍最安全的港湾。

匠心独运：
藏于建筑的文化密码

踏入陶南山馆,仿佛能触摸到百年前匠人的巧思。肥城市文保中心文物保护科科长孙健曾多次实地勘察,她眼中的陶南山馆,是北方庭院建筑的精致范本。

原占地78亩的五进院落,如今虽只剩28亩,却仍能窥见当年的恢宏。拱形大门门顶上曾有的垛口,暗合防御功能;二进院“归藏斋”的柱础上,一只蝙蝠口衔双桃的浮雕栩栩如生,“蝠”与“福”谐音,暗藏“福寿双全”的祈愿。再往后的厚遗堂更显深意,四根檐柱柱础上“长毋相忘、福祿未央、富贵无极、宜尔子孙”的刻字,是主人对家族延续、繁荣昌盛的祈愿。陶南山馆三至五进院均为四合院布局,每一进院落都设有东西厢房,四进、五进院落曾是藏书楼,三个院子建筑格式一致,这种“一棧三院六厢房”的独特格局,彰显出与众不同的建筑风格,在北方庭院式建筑群中独树一帜。

文脉流转：
从藏书楼到时代见证者

陶南山馆的命运,始终与古籍的流转紧密相连。1861年捻军突袭时,陶南山馆近半书籍被焚,宋元旧本损失近百种,杨绍和冒着风险收拾残卷,一页页重新装帧,硬是从灰烬中抢回了部分文脉;八国联军侵入北京后,杨绍和在京为官的儿子杨保彝辞官归隐,后对陶南山馆进行了修葺并扩建“眉园”,在编纂《海源阁书目》时,二十多万卷藏书在此整齐排列,“海内藏书,先生称首”的美誉,道出了这座院落的文化分量。

时局变迁终难抵挡。随着杨氏家道中落,杨敬夫迁居天津后,藏书陆续被运出,陶南山馆逐渐沉寂。

陶南山馆的历史,不仅是一部藏书兴衰史,更是与时代发展紧密交织的传奇。1944年—1946年,这里设立了肥城市第四区抗日高级小学,琅琅书声在此响起,为国家培养了一批批人才,在教育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。解放战争时期,它化身为解放军后方医院,医护人员在此救死扶伤,承载着珍贵的红色记忆,为革命胜利贡献了力量。1948年,肥城四区粮库在此成立,后改为王庄公社粮所,1970年粮所迁至王庄公社驻地,这里便改为花园粮站并沿用至今。不同时期的功能转变,它已然成为历史文化的重要见证者。如今,它又在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中被重新聚星。

“陶南山馆的价值,不仅在于建筑本身,更在于它承载的文化守护精神。”孙健表示,陶南山馆藏书籍文化作为肥城优秀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,已成为拓展和提升泰山文化内涵的重要力量。未来,文保部门将继续深入发掘陶南山馆的内涵要义和时代价值,让陶南山馆在新时代绽放出更加独特的光彩,也让更多人有机会领略这座百年藏书楼的魅力与价值。



历史学家许倬云去世,享年95岁

在历史求索中,思考未来

进入大众视野

信中评价:“用平实畅达的语言讲述了中国文化成长发展的故事,字里行间既有宏大的历史脉络,又有对日常生活的细微描摹,让读者在回顾数千年历史的过程中,深切感悟中国文化的精神气质,从历史文化中汲取力量。”

这件事让首次出版于2006年的《万古江河》再次大卖,也让许倬云收获了许多热搜。

2020年,访谈栏目《十三邀》发布了对许倬云的专访。谈及身体状况,许倬云淡然说道:“我的瘫痪是一个问题,骨头和肌肉融合了,神经没法治好,脚也不能动了。”此时的许倬云,日常生活几乎完全依赖太太的照料,仅剩两根手指尚能活动,他却从未放弃对知识的追求和对社会的思考。

节目中,许倬云谈生活、谈精神、谈过去与未来——

“92岁,随时可能完蛋的,我就觉得要

一生漂泊 一生求索

倬云一生产生了极大影响。

困难重重,许倬云还是努力在战火中学习知识。许倬云自述:“抗战期间书本不够,我们在战地四年半到五年,时时刻刻准备跑路。我听新闻、看报纸、听大人谈话,说敌人的炮声可以隐约听得见了,离我们20里了、30里了。敌军在哪里,父亲就在地图上拿个针刺着,挂个红的小钉子。今天打到这里,明天打那里。那些地名对我说,不是书本上的地名,是我们的军队在那抛血肉抵抗敌人进来……地图对我,地理名词对我,是具有生死意义的,这跟一般读地理书的不一样。这些教育,是地理跟你的生命合在一起……这些使得后来我正式上学后,历史和地理的书不用看,眼睛一闭就知道哪个城在哪里,发生过什么事儿。”

这期间,另外一方面的学问,则来自逃难途中的见闻。许倬云回忆:“从万县到河口,我们走过一个村子,一个活人也没有。村民染上一种不知名的瘟疫,逃的逃,死的死,全村都死光了。村外有些新坟,村里的房子空荡荡。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活的老

做有温度的学问

同的个体、群体‘interlock’——即互相套连起来,看它们互相刺激和互相引导后所产生的变化趋向,来指出在某个时代的某个问题上,哪种力量占据主导。然后,再换一个角度看另一种力量,去理解历史复杂的变动现象。”对于写作风格,许倬云这样自我评价。

如何定义许倬云的治学风格?“经世致用”或许更为合适。

许倬云是在江苏无锡长大的,当地人都知道“东林”两个字。东林祠堂里挂了一副著名的对联:“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,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。”

关心天下之事,几乎是许倬云一生的写照。不闻窗外事、专心做学问,许倬云不是做不到。但在他看来,历史学家可以有更多的社会担当。他的关心方法,在持续一生的写作治学当中,也在从不间断的对他人、对世界的关注中。

人的一生,无外见自己、见天地、见众生。许倬云是见过天地的人,古今中外,了然于胸。他对自己也早已看淡,只剩下对众生的态度。难得的是,许倬云愿意通过互联

许倬云,1930年生于一个大家族。他生来身体便有残疾,四肢先天畸形,手脚内翻,需要借助双拐才能走路。青少年时期亲历或目睹的历史事件,使他在身体的残疾之外,有着常人难以忍受的心灵创伤。但他以坚韧的态度去写作和生活,获得广泛认可与尊敬。

“哪天我走了,也只是走了一个残缺者而已。但我内在的部分,和天地、宇宙是共通的。”许多网友还晒出了2024年许倬云接受采访的视频截图。当主持人问及人生遗憾时,许倬云沉思数秒后,给出了这样的回答:“但悲不见九州同。”

近几年,因为两件事,让许倬云进入大众视野——

2019年夏,清华大学新生收到录取通知书的同时,还有一本许倬云的著作《万古江河》。时任清华大学校长的邱勇,在致新生的

7月24日,许倬云发了人生最后一条微博。

回忆起抗战时期川军开拔前往山东台儿庄的往事,他写道:“长大后我才晓得,当年川军派出一个师直奔前线,在台儿庄全阵亡,从士兵到师长,一个不留。这是我最难过的事情,当时我不过才八九岁,知道他们要去打‘国仗’,所以小孩变大人不是年纪,而是心境。”

这是一生刻骨铭心的经历。1937年,全面抗战爆发。许倬云一家住在靠近前线的湖北,此后不断避难。他的兄弟姐妹跟着难民学校步行几千里迁移,两三个月换一个地方。许倬云因身体原因,无法上学,跟随父母搬来搬去。

许倬云的父亲许凤藻曾参与辛亥革命,后在北洋政府海军部任少将。每天读报以后,他会在地图上插上大头钉,思考战局如何演变。许凤藻不仅关心中国战场的战况,也注意欧洲战场的情况。年幼的许倬云经常待在父亲旁边,父亲会不时将自己的意见简要地告诉儿子。每天发生的父子谈话,对许

许倬云虽是享誉全球的学者,却很难用传统学术标准评价他的贡献。

早年,许倬云研究上古史,学术代表作有《西周史》《汉代农业》等,有专门的断代、专门的研究范围,还有很深入的小细节。许倬云用这些细节来建构,复活那个时代的生活环境,以及当时的人们如何处理与世界和周边环境的关系。

在学术专业化的时代,知识分子的专业著作日渐与大众脱节,大众不关心,也看不懂许多知识分子在某个细小领域穷其一生的研究专著。这并不代表大众没有知识需求和知识焦虑。

鉴于于此,晚年的许倬云不再搞“专精深”,而是着眼“大历史”,写出《万古江河》《经纬华夏》《说中国》《中国文化的精神》等作品。他不囿于常规历史写作模式,用开阔的视野、独到的见解、平实畅达的语言,讲述中国文化成长的故事。这些历史普及类著作,可称作文化随笔,畅销多年,影响巨大。

“我写的书并不是真正的大历史著作,我主要用‘网络结构’这样的观念把许多不



□ 本报记者 张九龙

一位活跃在思想界与互联网上的睿智老人,与时代作别了。

8月4日,历史学家许倬云在美国去世,享年95岁。

幼时的战争经历,让许倬云拥有一般知识分子不曾有的丰厚人生体验,因此他对生命和文明格外敬重。这一点也始终显现在他的著述、言行之中。许倬云曾说:“我不在书斋里,我在人中间。”



□ 刘仲国

舞台之上,漆黑如墨,一束白光自天幕垂直坠落。光罩罩定,赤足舞者沉稳地踏落大地,低沉的重低音仿佛自远古传来,与场外环绕的稻浪翻滚之音浑然一体。刹那间,时间断裂,四百年农耕文明的呼吸扑面而来,观众不自觉地屏住了呼吸。这是陆川导演的舞剧《天工开物》惊心动魄的序章——无需台词,也没有传统戏剧的激烈冲突,仅凭足尖叩击大地的原始力量,便为中国古代科技典籍《天工开物》注入了滚烫的灵魂。

科技典籍的视觉化改编,向来是艺术创作的险峰,古今中外少有人敢于问津。抽象的技术描述与逻辑框架,似乎天然与舞台艺术所必需的血肉、灵魂与温度隔着一道鸿沟。正如有的学者评论,这个难度“类似于将一本《新华字典》制作成舞剧”——《天工开物》虽记载了十八种生产技术,但都是生硬刻板的工艺方法和流程,没有人物、情节和戏剧冲突的脉络。毕竟,宋应星不是曹雪芹。

陆川的破局之道,恰是从这“无故事处”掘

进灵魂深处。他以宋应星的一生为支点,这位六度落第,在科举泥沼中几度挣扎的儒生,最终脱去长衫,摘下儒冠,走向广阔的田野,走向真实的民间。当青年宋应星与暮年宋应星在舞台上时空交会,那灰衣士子被无形的枷锁束缚于舞台左端,而右侧白发智者俯身于大地,以颤抖的手指记录农人的每一次插秧、每一次耕犁,全场“此时无声胜有声”。而当老迈的宋应星将手中凝聚毕生心血的厚重书卷,郑重交给那个象征未来的青年手中时——技术文本完成了向精神史诗的转变。这正是一位“不走寻常路”的古代知识分子的“开物成务”之路,他从科举废墟上决然转身,最终在大地的怀抱里找到了真正的自我,跟那些皓首穷经只为求得一纸功名的“书蠹”相比,这难道不是一个“革命”性的变化吗?

如何将《天工开物》中“水火既济而土合”这类复杂的陶瓷工艺,以及“乃服”篇精妙的织造之法,化作舞台上可见可感的艺术语言?陆川的选择,是让科技与艺术彼此成为最深刻的注解。在“陶埴”一幕里,舞者裙裾旋转如风,全息投影在舞动间洒下流动的釉彩,碧色与靛蓝缠绕交融,恰似瓷器在熊熊火焰中涅槃而生;“冶铁”场

景中,舞者肢体刚劲如铁器相撞,赤红的铁流在空中变幻成一道道流动的火焰,如凤凰浴火盘旋。最令人屏息的,是舞者以肉身重构的劳动美学:农夫踩踏稻田的双足,似唤醒了天地万物的和鸣,织女缣丝的纤指曼妙流转,在光影中点染出生命线条的轻灵变奏。

而当一群泥灰斑驳的劳动者自舞台侧下一步步迈向舞台中央,每一步都沉着而坚定,每一步都踏出深深刻入地面的印记——此刻,传统戏剧理论中那无形的“第四堵墙”轰然倒塌。劳动,不再是被书写的客体对象,它以一种原始磅礴的姿态站立起来,浩然行进,成为真正推动历史前进的主体力量。

这场劳动美学的视觉奇观与深层意蕴,离不开现代科技的创造性赋能。陆川凭借电影导演的镜头思维,重构舞台的时空维度:双层纱幕巧妙切割,多重时空叠加流动;网格状的布景上,考生扭曲挣扎的肢体化作一幅幅科学“内卷”的残酷分镜。最震撼观众耳膜的复调声音叙事,源自作曲者的匠心——采集打铁、碾米、织布等百余种劳动原声,以电子合成编织成一部宏阔的大地交响。当冶铸环节风箱沉闷悠长的

呼吸声,与舞者胸腔起伏的气息同频共振,我们感受到的已不仅是音效,这分明是文明在时间熔炉中淬炼的深沉呼吸,穿越数百年岁月依然澎湃而滚烫。

谢幕时刻,当所有演员一同推动那由无数巨幅书页组成的恢宏航船,由远及近缓缓驶向观众席时,剧场里响起了沸腾的掌声和无数年轻人的尖叫。这部在明末政治动荡中湮没于中华故土的巨著,曾由商旅之手远播日韩,更曾被欧洲学者捧读,引发西方工业革命最初的哲思,而此刻,它以象征中华科技精神的方舟姿态,庄严地驶向未来。是啊,一部典籍真正的永生,绝非藏之名山的孤芳自赏,而在于每一次与时代创造力的深情相拥。陆川以现代剧场为媒介,让硬朗的科技符号沐浴人文之光,既为传统文化的“破圈”开辟出路径,更以艺术的感人力量重述那个朴素的真理。

真正的文明之火,永远在“用万物而不为万物用”的“开物”智慧中燃烧不息,它映照过去,更照亮着未来。舞台上由远及近驶来的那艘知识的方舟,载着不灭的火焰,在每一个被震撼的灵魂深处,继续它永恒的前行。